

# 耶穌會士艾儒略

## (Giulio Aleni, 1582-1649)

### 的宣教策略

香港信徒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宗教的態度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抗拒排斥；(二)採取中庸；(三)欣賞接納，並希望從中吸取其精粹，以作借鏡。當我們追溯先哲古人的宣教工作時，發現他們在發展基督教同時，亦深研中國文化及宗教，以作對話，下文嘗試以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宣教工作作一例子說明。

#### 艾儒略入華傳教背景

艾儒略於1582年在義大利北部的布列西亞(Brescia)出生，布列西亞由於巴朗尼主教(Bishop Bollani, 1559-1579)的關係，在這裡藉著教理組織及慈善團體，主導宗教生活的更新，創造了一個相當好的宗教氣氛，這也許是使艾儒略將他一生獻身於宣教事業的社會背景。

艾儒略在其十八歲完成了布列西亞學院的學業，1600年11月1日進入諾維勒拉學院(College of Novellara)學習天文學及數學。1602年被派往帕瑪學院讀哲學、邏輯、和物理學。1603年5月16日艾氏寫信給他的老師Fr. Claudio Acquaviva，表明他願被差派從事宣教工作。1607年12月，艾氏進入著名的羅馬學院(Collegio Romano)接受兩年的神學訓練。後來我們可以看到艾氏能與中國士大夫論學，並有豐富多樣的著作，乃因他已接受了長達十二年紮實的訓練。1609年艾氏到中國宣教的申請終被接受，1611年終於抵達澳門，開始學習中文。

#### 艾儒略在杭州的宣教工作

艾儒略進入福建傳教之前(1925年)，曾幾度上京，到過陝西、山西和開封，其餘時間大多棲居於杭州。艾氏在杭州遇上了兩次由沈灌發動的教案，第一次教難發生時(1616年)，艾氏與其他六位教士避難在杭州楊廷筠(1565-1627；中國開教三大柱石之一)家中，這次教案的發生反而讓艾氏因禍得福，因為他跟楊廷筠學很好的中文，他的中文程度可能是在所有的西教士中最好的，因為他能用流利的中文進行豐富的著作。

1621年揚州又再發動第二次教難，這次沈灌誣告天主教與白蓮教皆是亂黨，此次教難持續三年之久。艾氏於1623年前後，已能運用所學到的中文出版了五篇重要的著作，《萬國全圖》和《職方外紀》這二本著作主要介紹西方的地理，《西學凡》是介紹教育，因為這些知識是當時中國人前所未聞，因而受到許多中國士人的歡迎；同年出版的還有《張彌額爾遺跡》，是記載張賡之

子張識的奇異事蹟；還有一本哲學性的作品《性學辨述》，則是討論靈魂、身體及中國思想中的人性論。「人性論」的問題，一直為艾氏所關心，這是他與中國人討論天學最重要的課題，因為「性善」與「性惡」是中國人早已爭辯不休的問題。

艾氏藉這些著作喚醒人們溯流窮源，循末求本，進而奉奉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這種做法與當時朱學的格物致知，有著共同的原則，就方法而言，二者是相同的，也是當時士人所較能接受的方法。

在此同時，艾儒略產生了入閩傳教的念頭，但後來還是沒有成行，根據費賴之的說法：「儒略有志傳教福建久矣，惟因居民風俗放逸，山道崎嶇，語言難曉，因是未果。」<sup>①</sup>於是艾氏繼續留在杭州，等待機會。1624年7月(天啟二年)閣老葉向高辭官返鄉，路經杭州，停留在李之藻家，此時艾儒略來訪，成為他進入福建傳教的重要關鍵。

## 艾儒略在福建的宣教工作

艾儒略進入福建之後，於1625年春以「天命之謂性」的題目，與許多的福建士人討論「天學」，艾氏提出「天」並不是非人格、機械式運轉的宇宙，而是有位格的上帝在掌管，宇宙乃是跟隨上帝的「命令」運作。因此「性」也是上帝所創造，賦予了分別善惡的知識，只是由於「原罪」使得「性」敗壞，故要靠上帝的恩典使「性」恢復完美，因此艾氏嘗試以「克性」來代替「率性」。

艾氏這次的論學語驚四座，雖然有些中國學者提出他們的質疑，然而也有人認為艾氏對中庸的解釋並不與儒家的見解衝突，甚至還可以補儒。

艾氏對中國經典的熟稔，大量的中文著作，為他在中國樹立儒者的清新形象，「論學」的傳教策略帶來初步的宣教成果；然而艾氏也透過「神蹟」領人皈依上帝，這是艾儒略傳教工作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

艾氏為了收傳教更大的成效，口述官拜河南按察司副使的楊廷筠由佛教改信天主教的事蹟，由丁志麟筆記寫成《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楊廷筠的改變切合了耶穌會士融合儒家、反對佛教宣教的方針，而楊廷筠的皈依正符合當時耶穌會士傳教的策略。艾氏藉楊廷筠反佛的事蹟，打擊當時流行福建的佛教信仰以及民間信仰。

錄有艾儒略談話記錄的《口鐸日抄》，記載了艾氏在福建的傳教，有不少人士受洗入教。這些皈依的士人並不是達官顯貴，都是屬於鄉間士人，大多考取功名不第，但在地方上稍有名氣之輩，也能詩能文。《口鐸日抄》顯示這些人極為尊敬艾儒略，主要原因是艾儒略解決了這些人在儒學上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有不少人士從艾氏的教誨下，改變了僅求取功名的人生價值觀，而以追隨艾氏所傳的道為念；亦有人不滿當時的科舉制度，認為當時的學問忽略了人生死問題之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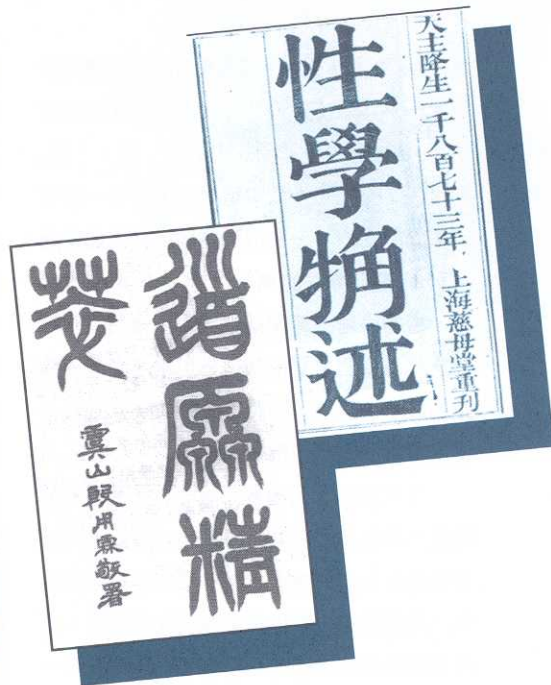
1637年，艾氏的宣教工作走向高峰時，卻有鄉民密告福建巡撫施邦曜，因而在寧德縣和福安縣發佈〈福建巡海道告示〉，指有人暗藏「夷人」，天主教宣傳天主為至

尊，以天堂地獄為指歸，造成違背中國風俗的問題，導致教案接連不斷。艾氏一直對佛教的批評可說是導火線，從《口鐸日抄》卷二開始，即有譏評佛教和道教的題目，但主要以反佛為主，如「答釋玄二家總非正路」（卷二）、「答闢佛之力總為世道人心」（卷五）、「答闢釋氏之邪為忠於所事」（卷六）、「答釋教專事明心，為誤人第一義」（卷七）、「答佛老之非」（卷八）等。因此，具有王學與佛教背景的儒士對艾氏的傳教活動大為反感，反擊他關於「性」的解釋，及不知尊重中國風俗乃為「禽獸」。

這些反教者對艾氏傳教產生的反應，歸納來說有三大方面，一、即以文化優越意識的「華夏中心」思想，貶抑天主教是野蠻的文化，邪惡之說；二、以儒學正統意識來說，艾儒略熟稔儒學及成功的傳教策略相當程度威脅他們在地方的地位，他們認為艾儒略是陽關佛而陰貶儒；三、以社會群體意識來說，從利瑪竇開始，艾儒略等人對佛教的攻擊，激起了佛教團體人士的凝聚力，便以艾儒略為首的一干西教士做出口誅筆伐，另外就是與官方關係良好的地方鄉紳聯名上奏，表達天主教嚴重威脅他們原有禮教風俗和社會地位，須加以驅逐。這三方面是反教者主要所持的心態，也代表著他們對天主教絕不妥協的態度。

教案稍平後，艾儒略的傳教已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大張旗鼓，要花較多的時間重建信徒的信心，而且時值明末政局動蕩不安，戰爭帶來的破壞遠遠大於傳教所做的努力，教案發生之後，艾儒略的主要工作即堅固奉教者的信仰，使教務重新恢復。

艾氏的晚年相當不如意，處在改朝換代的困境中，戰亂帶來的破壞，對他在福建辛苦建立的傳教事業是重大的打擊，但這一切並非他所能控制。1647年清軍攻入福州，艾氏逃到莆陽，向門人表露有厭世之意。後因於延平府半年，延平府是艾氏在福建活動的最後一站，他在城圍之際，猶節餐縮食以救濟病旅，從此身體多病。在1649年四月底他至張廣文家奉彌撒，隔天清晨，叫眾人一起伏案恭呼耶穌瑪利亞數聲而逝，結束了他在福建二十五年的工作。



## 結論

「性」是艾儒略最關心的課題，改中庸「率性之謂道」為「克性之謂道」論超性之學，性由天主所給，對於朱學支持者而言，是較能接受的，這是艾氏在福建傳教初步獲得成效的主因；但同情佛教的王學支持者，認為「性」非外來之物只能「克習」，對艾氏加以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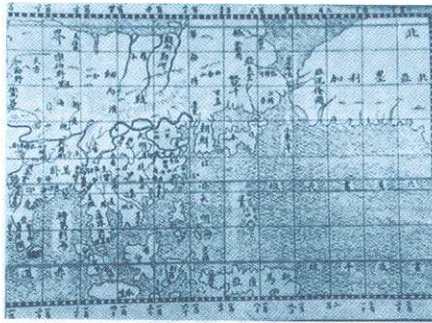
艾氏另一個成功的策略即是文字傳教，他的著作琳瑯滿目，這幫助他達到幾個目的：宣傳天主教教義，比利瑪竇更直接表達信仰的核心、介紹中國人感到陌生又好奇的西方世界、出版中文禮文，便於牧養中國人、排斥佛教、道教達到護教或提升天主教地位的作用、以問答的形式與中國人對話，處理一些艱深的形上學問題。艾氏的著作豐富並且涉及層面廣泛，筆者根據 Criveller 將艾氏的著作所分五大類擴充為七大類：教理類（《萬物真原》）；道德類（《聖夢歌》、《五十餘言》）；牧養類（《滌罪正規略》、《彌撒祭義略》、《聖體要理》、《耶穌聖體禱文》）；啟發性自傳類（《張彌格爾遺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基督論（《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天主聖教四字經文》）；中西對話類（《三山論學記》、《天主降生引義》、《口鐸日抄》）等；介紹西方

世界(《萬國全圖》、《西學凡》、《職方外紀》、《西方答問》);科學類(《幾何要法》)。按《天學初函》分「理」編、「器」編來說,艾氏二十二本遺世的著作中,只有一本屬於「器」,這很容易發現艾氏並非藉用科學搭起傳教的橋樑,而是在天主教教義、道德倫理的範圍與中國人直接對話。除此之外,我們也要留意艾氏也常用靈蹟、異蹟的故事,甚至行神蹟導人皈依,這些都是艾式傳教的方法和策略之一。

艾氏其中的另一個策略,透過葉向高的關係,與許多高官論學於福州,這讓他與許多福建士人建立關係,甚至詩文交友互向唱和,然而這些人都僅是維持朋友的關係,始終都無皈依天主教,這些人正如葉向高一樣,真正的關心是在先王之道的復興與國家的盛衰,如蔣德璟在國家滅亡後,即一再辭官歸故里。

在奉教人士當中,發現多半是以家族為主,如葉向高之孫兩兄弟;李九標、李九功兩兄弟;陳景明、景耀兩兄弟;嚴贊化及兒子嚴謨、張賡及其兒子張識等。這群奉教人士官階普遍不高,大部份沒有功名,但與艾氏來往頻繁。這些人對當時的科舉取士和傳統的學問忽略對人生死問題之解決相當的不

滿,因此艾氏的傳教,給了他們新的人生價值觀。這批民間士人是一般百姓的中間人,他們沒有官階的壓力,他們熟悉儒家的傳統,能文能詩,能幫助艾氏的著作,而這批人也較艾氏年輕(除張賡以外),也較尊敬艾氏,他們成為艾氏在百姓中間傳教的好助手。當艾氏去世之後,他們還得到耶穌會的敬重,撰寫有關中國禮儀的問題。不過在教案發生之後,這些人並不能像徐光啟或楊廷筠等人有較高的地位,可以保護他們的安全。



艾氏以士人的形象出現,並且得到「西來孔子」的美譽,他熟知中國禮儀對於中國人有著重要的意義,並不反對祀祖、祀孔、葬禮等,只是主張去除具有雜祀意義和迷信的成份,他的根據是找出古籍中所有來源,以區別何者原來所無。對於某些儒士,他的

主張並不與儒家衝突,甚至有補儒的作用。然而相對於民間信仰,艾氏的主張卻招致「禽獸」的譏評和迫害。

艾氏在福建的開教,開頭成效頗著,後卻以悲劇性的結果收場。教案發生時,正是明朝走向滅亡的時候,艾氏兩面受敵,他必需堅固受教案逼害信徒的信仰,然而兵燹災禍又無情的摧殘辛苦建立的教堂和信徒,福建的傳教事業似乎來不及找到另一個耶穌會士接手,他就抑鬱而逝。從傳教策略的角度來看,艾氏達到了他的目的,也收到成效,改朝換代雖然摧毀艾儒略辛苦奠下的基礎,但這已不是艾氏所能控制的了。



①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34。

## 參考書目:

明·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收入於鐘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台北縣:輔仁大學,1996年,頁919-937。

明·李九標等:《口鐸日抄》。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八卷本。

明·徐昌治編,夏瑰琦校編:《聖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年。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67年。

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年。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陳壽祺等撰:《福建通志(清同治十年重刊本)》。台北:華文書局,1968年。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潘鳳娟:《西來孔子-明末入華耶穌會士艾儒略》。新竹:清華大學碩士論文,1994年。

鐘鳴旦:《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7年。

Zücher, Erik. "The Jesuit Mission in Fujian in Late Ming Times: Levels of Response" In E. B. Vermeer ed.,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417-457.

Criveller, Gianni. *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 (1582-1649): The Jesuits' Presentation of Chri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Mission to Giulio Aleni (1582-1649) and Chinese*.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97.

Goodrich, L. C. and Y. Fang,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Menegon, Eugenio. "A Different Country, the Same Heaven: A Preliminary Biography of Giulio Alenis, S.J. (1582-1649)."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15(1993), 27-51.